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施洗约翰的激情

胡风文艺思想探究

孔育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

SHIXIYUEHANDEJIQING:HUFENG WENYISIXIANG TANJIU

施洗约翰的激情：胡风文艺思想探究

孔育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洗约翰的激情:胡风文艺思想探究/孔育新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12

(三峡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5649-3602-0

I. ①施… II. ①孔… III. ①胡风(1902—1985)—文艺思想—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9545 号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纪庆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代序)

王富仁

我认为,要理解胡风文艺思想的实质意义及其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应当理解中国新文学的本质意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的?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对“五四”新文学发生根源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自身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移植。我认为,不论胡风的用词是否为人们所乐于接受,但他所表达的观点本身却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化史的事实异常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了,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一个自满自足的封闭系统,如若没有任何外力的撞击,它自身的发展将永远是循环式的。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没有依靠自己的自然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化也只能是如此。为什么它不可能走出自我设定的这个封闭式的循环圆圈?为什么它只有朝代的更迭、儒道文化的此伏彼起、一治一乱的周而复始?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将中国人民的精神规范化和凝固化了。不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道教文化,还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都是以压抑或节制人的个体生命欲望和主观精神意志为特征的,胡风反复强调表现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创伤,说明他充分意识到了奴性意识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戕害。而不用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冲击,洗刷掉这种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奴

性意识，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显而易见，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并不在于鸦片战争后中国那点微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论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还是中国新文化的杰出代表鲁迅，都不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发展有多大直接联系，他们是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后有了改革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决心。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发生的是主体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观精神上的变化，因而同样的客观现实在他们眼前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新文学的发生不是祥林嫂变了，闰土变了，阿 Q 变了，而是表现他们的鲁迅的主体意识变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主观精神的变化，便没有“五四”新文学。但作家主体精神的变化，不仅仅是西方文化观念的简单接受，而是通过这种接受开发、强化了作家内部的主观精神和个体的生命力，冲击了他们的传统奴性意识。他们的“新”，并不“新”在有了“新”知识、懂了“新”名词、提出了“新”口号、掌握了“新”技巧，而是因为他们较少传统奴性意识、具有现代意识的一代新人，有了新人，有了新的精神境界，才有了新文学。但这种“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种由旧蜕新的不断变化过程，是一种有多级精神层次组成的序列，主体精神的每一种变化，都改变着作家眼前的客观世界的面貌，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也必须在这种过程中变化和发展。但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中，仍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并不把这种主体精神的变化作为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问题。胡风所集中批评的便是这三种趋向。

第一种情况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趋向，他们更多地注重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新潮流本身，当自身接受了西方某些新的理论标准之后，便以为自己是这种理论的实际持

有者了,而较少注意如何把这种理论实际地移化为自己内在的主观精神素质。因而他们的主张变化很快,像拣萝卜一样扔掉一个又拣起一个。第二种情况是像周作人、林语堂这样的一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他们的特点是对旧文化的弱点有较清醒的理性认识,但这种认识也愈加使他们感到改造传统文化的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愈加强化了自己的精神抗争力量,而是愈加委顿了这种主观力量。在他们那里,理性认识的清醒化与主观精神力量的弱化是同时发展的。第三种情况是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趋向,他们更强调对现实的理性认识,认为正确地分析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前提。但脱离主体意识的不断深化发展,外部的客观现实将永远是一种色调、一种面貌。这种现实主义缺乏对人的精神震撼力,更多地着眼于对现实的描述,胡风称之为客观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胡风并非绝对否定以上三类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但作为一种整体创作倾向,他是持严峻批评态度的。作为与以上三种创作倾向对立的,胡风总结了鲁迅的创作倾向。可以说,胡风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在总结鲁迅的创作经验中建立起来的,这使他同时成为一个杰出的鲁迅研究专家。正是在全面总结“五四”新文学和当时左翼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胡风提出了作为他文艺思想核心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命题。他重视作家的主体精神的作用,但更重视这种主体精神在创作实践中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他提出作家必须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现实,突入现实,肉搏现实,也就是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现实而同时又在把握现实、表现现实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体精神,加强主观战斗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胡风所说的作家世界观的改造,并不是教民接受圣徒的渡引,学生接受教师的训导那种卑屈的、被动的改造,而是作家进行的主动

的、自觉的自我文化心理的调整。在这里，自我改造和创作自由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胡风对作家的评论是严峻的，但同时又为作家的创作自由而斗争，他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哪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正视作家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表现和挖掘，反对以先验的理论束缚作家。显而易见，胡风文艺思想的这种统一性，恰恰因为他紧紧抓住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最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即是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医治中国人民群众几千年来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文化与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风把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了起来，对内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作家自身要摆脱传统奴役性意识对自己的束缚，而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又只有在与社会传统奴役性意识的斗争中才能得到表现和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胡风反对把“形式”和“内容”完全对立起来，反对把传统的形式当作“民族形式”凝固化起来，他认为在传统的形式中凝结着传统的意识，作家主体意识的发展必然通过艺术形式的发展才能得到体现。这一切，都表现出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新文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从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个基点上开始的，鲁迅早期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对“主观意力”的重视，“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辟人荒”，左翼文艺运动中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冯雪峰提倡的“主观力”，新时期文学中刘再复提出的“主体意识”，在精神实质上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因而我认为，胡风文艺思想理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占有一个崇高的位置。

但是，胡风文艺思想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我认为他的文艺思想仍然没有挣脱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当他把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历史决定论结合起来之后，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含义变得相对狭窄了，现实的具体历史任务限制了主观战斗精

神的更多方面的内涵,这在创作方法上使胡风把自己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文艺论强行纳入了现实主义这种相对狭小的文艺框架中来。事实上,胡风文艺思想的这种偏执化,是与他对中国传统奴性思想和现代个性意识的偏狭化理解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文艺思想及一般文化思想的特征是在各种对立原则中把握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他把阿Q的消极忍耐和盲目革命都当作奴性意识的表现,同时又把个性解放与人类同情都当作现代意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对立原则的彼此制约中,鲁迅较之胡风更充分地估计了中国文化改造的艰难性,因而他的思想中有更多悲剧意识,而胡风更多乐观主义,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更多地与“韧性”结合在一起,胡风虽然重视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的提倡,但实际并没有在鲁迅的原意上理解“韧”的含义。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更多地与清醒的理性认识组合成一体,胡风对现实的认识远不如鲁迅细致和明敏,他对意志、精神、感情的重视远过于对现实细密认识的重视。他对现实人的了解陷于粗疏,鲁迅则有为胡风所不及的惊人的深刻。在实际的美学观念上,鲁迅更重视自然生命力同合理理性的结合形式,对原始生命力的盲目破坏作用有更加痛切的感受,因而他的作品更少外部的豪壮美,更多内含的严峻美,而胡风更重视原始生命力自身的价值,他的文艺思想以及在他文化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文艺作品更多外部的震撼力,而没有鲁迅作品的忧郁美和严冷色彩。这或许是他的文艺思想和作品的个性特色,但在这个个性特色中也表现着他的局限性。

胡风为他的缺点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我们更多地记住他的贡献吧!

目 录

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代序)	王富仁(I)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研究综述	(2)
三、论文思路与框架	(11)
第一章 典型论	(20)
第一节 “型”的流变:西方思想视域下的“型”	(20)
第二节 什么是典型:西方美学视域下的典型观念	(31)
第三节 “典型”论争:并不成熟的典型观	(44)
一、争点之一:典型的普遍性和个性	(44)
二、争点之二:社会的物事与个人的物事	(48)
第四节 “花”“路”“诗”	(52)
一、“鲜花”与“心花”	(53)
二、向理想延伸的“路”	(58)
三、诗意的“瞬间”	(61)
第二章 激情	(66)

第一节 时代影响与理论溯源	(67)
一、时代思潮的碰撞与融合	(67)
二、崇高感:“激情”观的美学内涵	(73)
三、施洗约翰:激情的精神原型	(77)
第二节 “主观战斗精神”论	(83)
一、“幽默”与“霭利斯的时代”	(83)
二、“天才”论	(90)
三、预言与批判的“诗人”	(96)
第三节 析“精神奴役的创伤”	(100)
一、厨川白村:作为意象之“源”	(100)
二、逻辑机理:主奴关系辩证法	(104)
三、“转身”与“悔改”	(107)
第三章 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倾向性	(111)
第一节 现实主义:从笛福到高尔基	(111)
一、小说与形式现实主义	(111)
二、真实性与倾向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	(115)
三、俄苏现实主义理论	(120)
第二节 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	(127)
一、主题积极性的提出	(127)
二、反对客观主义	(130)
三、反对主观公式主义	(143)
四、现实主义的路	(153)
第四章 “民族形式”论争	(159)
第一节 何谓形式	(161)

一、西方美学思想中的“形式”含义	(161)
二、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民族形式”的理解	(163)
第二节 “民族形式”讨论概览	(169)
一、延安的讨论：通俗化与现代化之争	(169)
二、香港的争论：“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174)
三、重庆方面的论争：大众化、通俗化、现代化、 中国化	(177)
第三节 胡风的民族形式观	(185)
一、对“文艺大众化”的回溯	(185)
二、胡风的形式观	(189)
三、“五四”新文艺与民间旧文艺	(196)
四、新情势下的进路	(200)
结 语	(206)
附 录	(210)
一、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叙事模式研究	(210)
二、家园与旅程——后花园与蒋氏三兄弟	(224)
三、胡风研究：历史的还原与问题的凸显	(238)
四、舒芜“主观论”思想的谱系学考察及再评价	(254)
五、告别恩师王富仁先生	(276)
参考文献	(284)
胡风著作、编辑、通信	(284)
文艺理论基础著作	(284)
现当代文学、文化论著	(287)

胡风研究专著	(288)
致 谢	(290)
出版后记	(292)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对胡风本人的兴趣最早是从胡风冤案开始的,同情于胡风的不幸遭遇,敬重于胡风的坚持。后来接触到胡风的作品,惊叹胡风在作品中的强大的情感气流和倨傲的论辩姿态,在尖刻和偏执的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执拗的力量。因此,也就有了做胡风研究的念头。

无可讳言,在现代评论家中,胡风并不是最具艺术批评品格的。与鲁迅、沈从文、李健吾等批评家那透明无尘的作家作品批评相比,胡风并不占优。然而,胡风的文艺批评中透露出来的难以遏制的伦理力量,那深广的叹息和焦躁的呼唤,那行走于荆棘之路的双足流血的圣徒的悲欣,那峻急、严苛、嘲讽的文笔下涌动的仁爱 and 勇敢,那夹杂着时代的丰富、庞杂、分裂而又力图铸成超度之舟的自信……这一切都构成了胡风文本整体的抒情特色,穿越时间的长河仍不减心灵撞击的力量。

自20世纪30年代胡风开始他的创作和文艺批评生涯,胡风似乎一直处于论争的漩涡当中,和他论争的既有学院派的批评家,有国民党的政客,也有左翼内部的作家与批评家。而更有意思的是,从3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带来的文学界、思想界的频频转型,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

(尤其是左翼内部)的思想本身多多少少也发生了变化,而胡风的思想似乎仍一以贯之,他带着自己一贯的立场而参与的各种论战,既记录了那个时代思想流变的面貌,同时也为这段变迁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此,研究胡风,也是理解现代文学批评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研究综述

在1980年9月29号中央第一次为胡风平反前,一些学术单位和部门已经以研讨会等形式开始为胡风“平反”。1980年第1期《南京师院学报》刊登了王臻中整理的《解放思想,探索现实主义发展规律》一文,对1979年11月26日到12月5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举办的现实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其中提到批判胡风的问题。会议有三种意见:一是胡风可以批判,但搞得过头了,后来发展成政治运动更是错误的,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坏的作用,实际上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在今天还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二是胡风文艺思想当然不会完全正确,但基本上是坚持唯物的反映论的,不是唯心论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实际上是化客观物质力量为主观精神力量,是对创作中作家主观的创作热情和创造精神的强调。我们今天讲的写真实,没有超出胡风当年讲的范围。三是胡风问题,当年最严重的一条,就是说《讲话》是图腾。其实图腾一词,跟今天的“神化”等提法相比,根本不算得一回事。这是目前为止第一篇看到的为胡风文艺思想“正名”的文章。随着胡风事件的平反,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胡风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罪证”现在成为一种理论“创见”。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文章有:胡铸的《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

特点》和《胡风文艺思想探源》，朱寨的《胡风的文艺批评》，陆一帆的《论胡风的文艺思想》，邹华的《胡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等。胡铸对胡风的研究更多地带有一种“翻案”与“正名”的性质，在理论探索上似乎还有待来者。而邹华把胡风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连接起来，在具体的阐发中有着相对新颖的理论洞见。他认为，胡风的文艺理论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美学所达到的理论认识也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审美感性问题是胡风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贯穿他的全部理论活动的主线。他通过对“感性”的强调，把审美与功利活动和认识活动区别开来，从而避免了以功利或认识取代审美的错误；他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对艺术家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在当时可谓是先见之明。邹华的这些观点明显看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学热”和“主体论”的影响。这也标志胡风文艺理论研究在经过短暂的所谓的政治“正名”后很快与 80 年代的新思潮接轨，转入相对开放和深入的学术探讨中来。

与国外的作家、批评家的横向比较，如卢卡奇、厨川白村、高尔基……是 20 世纪 80 年代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这种横向比较，主要侧重于寻找胡风文艺思想成分中的理论潜能，融入当时的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张国安在《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中梳理了胡风所接受的外国哲学、美学、文学思潮，他认为，胡风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大致可分为三块：“一、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二、别、车、杜、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卢卡奇、厨川白村、‘拉普’等的文艺

美学思想。三、苏俄和欧洲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感性营养。”^①在具体分析中，他对厨川白村与胡风的思想影响关系分析得尤为详细到位。乐黛云在《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中把胡风与周扬的争论，放到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的视野下，和当时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争论做了细密的比较。张国安则在《莫把形似当神似——胡风和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错位》中指出，胡风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作为理论基点，以主体为轴心，以作家的创作作为批评的入口，更注重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性；而卢卡奇则以“反映论”为理论基点，强调客观现实的整体性和客观性，更注重审美形式的独立性，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艾晓明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里，对胡风的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胡风和卢卡奇的比较研究，做出了深入的剖析。艾晓明认为，胡风和卢卡奇都坚持现实主义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们都强调现实主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外在尺度是现实生活本身，它的内在尺度则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达到的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但胡风和卢卡奇的批评模式又有深刻的不同，即以胡风为代表的主体模式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客体模式。在卢卡奇的艺术反映论里，“客观性”占据着中心位置。卢卡奇认为艺术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在艺术提供的现实画面里消除了现象与本质、个别与本质、直接性与概念的对立，艺术通过自我塑造、自我阐明的方式构造成一个自足的世界，独立地存在和发生作用，它是运动着的生活总体的反映，是生活作为过程和整体的反映。而胡风则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反映的能动性，通过作家

^① 文振庭、范际燕主编：《胡风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45页。

的创作过程看对现实的反映程度,对象与目的之间和本身都充满了动态和矛盾的特点。

另一方面,胡风与“五四”“左翼”“京派”等文学思潮流派及其作家的辨析,也是20世纪80年代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热点。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对20世纪40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胡风是“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捍卫者,是着重于继续吸收外来文化并结合中国现实斗争来创造民族文艺及其形式的代表。但由于主要是从文艺自身的规律来谈论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比,“便显得远为单薄、辽阔,空洞而不切于事情了”。钱理群在《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中,从左翼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的扬弃、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等问题入手,梳理了胡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承接、扬弃,以及胡风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论文材料翔实、文字富有激情。王富仁的《胡风的深刻性与独创性》一文,认为胡风对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学院派”文学,以茅盾为代表的“理性化”现实主义文学给予了严厉批评,而与这三种文学倾向对立的,则是鲁迅的创作传统。胡风所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鲁迅早期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吁,对“主观意力”的重视,“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辟人荒”,冯雪峰提倡的“主观力”,新时期文学中刘再复提出的“主体意识”,在精神实质上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但胡风还没有摆脱历史决定论的束缚,现实的具体历史任务限制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更多方面的内涵,充满活力的文艺思想被纳入现实主义这个相对狭小的文艺框架来,在对传统文化和其他非左翼文化文学的态度上有着偏执化和偏狭化的缺点。高远东在《历史·价值·主体性》中,则认为现实主义,对胡风来说,不仅仅是创作方法,而且还是一种